

編 續 庫 文 方 東

題 問 護 保 童 兒 女 婦

編 主 五 五 雲 王
五 聖 李



念 年 十 社 雜 東
刊 紀 週 三 誌 方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9935B



婦女兒童保護問題

目次

目前中國之婦女兒童保護問題	金仲華(一)
職業與母性	碧城(一五)
國難聲中之兒童教養問題	林仲達(二〇)
托兒所嬰兒院之理論之基礎	孟如(六一)
蘇聯婦女兒童保護的理論	趙涵川(七八)

目前中國之婦女兒童保護問題

金仲華

在任何社會或國家的災亂禍變中，最先受到影響的總是婦女和兒童。這原
因是，就在目前婦女已得到部分的解放，而社會和生理的關係始終使她們不能
不相當的依賴於男子；至於兒童，則天然就需要受人的保護；所以，當災亂禍變掃
蕩了一般人的生活的憑藉，男子還能仗着本身在生活場中所訓練成的能力，追
尋保全自己生命的途徑，而失去了依賴者保護者的婦女兒童，便求生無路，成爲
不幸中的最不幸者。在這不景氣的年頭，各國都從經濟的蕭條中產生着大批的

難婦和苦兒。至於我國，則因內戰，外患與災荒的循環不息，直接打擊到一般人民的生活，災難婦女兒童的數目尤其多過於他國。

我國素來缺乏統計，所以幾年來在國內的災變中受到直接影響的婦女和兒童，還沒有在數字上給人以可驚的印象。但是在報紙所刊載的新聞中，如果我們少去看那些粉飾太平的故事，而多多留意關於民生疾苦情形的記載，則可以知道在這幾年來，婦女和兒童是遭遇到怎樣的不幸了。去年夏初天津國聞社發出關於河南春荒的消息，說河南鹿邑一帶，春糧告絕，人民無以為生，婦女和兒童都立成人市而待售，價貴的僅十餘元，賤的僅三五元；同時又說起一個婦人因數日不食，甚至把她的女兒向賣餅者換得一個大餅充饑。這新聞會引起不少人的注意，認為是一則可以象徵災區婦女兒童所過悲慘生活的故事。但是注意的還有人，而救濟和保護則始終缺少整個的辦法。在本年，災區婦女兒童所過的悲慘

生活更甚於往年。據一九三三年六月本埠大美晚報載北平通訊說起河北華洋義賑會陝災視察專員季履義報告陝西災區的狀況，其中有一段這樣記着：

「災區甚廣，災民無數……房屋被拆以換食物者已達三分之二，或五分之四；農具牲口及一切可以換錢物品俱已典賣，以維持生活；除隨身破爛衣服及破坑上一被外，災民一無所有……鄉村人口女人及童孺佔五分之四，因男人都已外出尋食；成年女人出賣，約每一歲值一元錢，雖省政府屢次宣佈禁止，然賣契常云用作妻媳，故無法斷絕。」

還有，天津大公報載西安通訊也說：

「……殘留之民，率皆鳩形鵠面，初則拆賣房屋，繼則售及妻女；舉凡有災之地，未有如武功之慘者。郿邑棗爾小縣，天災人禍，交相爲厲，慘苦之狀，重於全陝。咸陽渡頭，西安市上，所運浮陳列之房料，多屬郿縣；潼關出口之婦女，亦半屬郿籍，售洋不過三五元。」

像上面所引述的，只是關於災區情形的最簡略的記載，但我們已可以充分見到，

在這種災難中，最受到不幸的乃是婦女和兒童。

不僅在災區，就在上海這種表面繁榮的地方，婦女和兒童的遭遇也極多不幸。讀報的人從本埠新聞欄中，可以看出拐賣婦女兒童的案件，在中國當以上海爲最多。正像在商業上，上海是我國貨物的一個大集散港一樣，在拐賣婦女兒童的事業上，上海乃是內地各省拐得的婦女兒童出售的一個大市場，也是大批婦女兒童被拐而售往內地各省的一個根基地。關於這種情形，我們雖沒有具體而準確的統計，但從平日的觀察中，可以斷言在上海每月至少有一次大批拐賣人口案的破獲，而零星的拐賣案總在五六起以上。在這種案件中，婦女的拐賣大都是趨向於強迫賣淫的一途的，而兒童的拐賣則多數是趨向於充作體力奴隸的一途的。

在這種把婦女和兒童作爲商品買賣的情形下，發生着種種殘忍虐待與獸

性壓迫的例子。而歸根的說，則是婦女與兒童的人權的儘量被蹂躪。至於一般家庭中的婦女的被虐待，兒童生命的被忽視，與這二者的文化生活的根本缺乏，不過是上述的極端蹂躪的一般反映而已。

真的，正如許多關心社會情形者所指出的，我國婦女兒童的需要救濟與保護，在目前已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問題不僅嚴重，且因近年來人權思想的擡頭而顯得非常迫切。幾年來，我們曾經讀到不少文字，對於這國家的許多生命——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的生命——在災變和各種磨折中的犧牲，表示可惜。對於婦女地位低落和嬰兒死亡率增高的成爲我國國際聲譽上的污點，許多有感覺的國人，已經認爲是一種恥辱。就在政府立法當局，也因了潮流的影響，而漸漸有注意於保護婦女和兒童的權利的傾向。例如，廢娼，禁娼，禁婢，以至保護女工童工的法律的頒布，雖然這些有大部分不見得嚴切實行，但可以顯出對於婦女兒

童的人權保護的問題，不僅一般輿論感覺得嚴重迫切，就是政府當局也已有着同樣的感覺。

那麼，對於這個嚴重而迫切的問題，應該怎樣的加以補救和解決呢？當然，從根本上說，這問題的徹底解決應該在於消滅社會上造成災亂禍變而陷婦女和兒童於不幸的原因。但是，在目前，我們似乎不能談得那麼遠。而且，就在社會整理得完全上軌道以後，婦女和兒童依然是需要特殊的保護的。所以我們目前的注意點，不妨放到當前的補救和怎樣進行實際的保護的方面。關於這種補救和保護，我們可以分爲二層講，就是：第一，國家對於婦女兒童保護所應負的責任；第二，婦女本身對於一般婦女兒童保護事業所應負的責任。

關於第一層，我們要指出的，就是我們國家的政府對於婦女和兒童的保護，必須負最大的責任。而且，這種保護的責任不僅應成爲空洞的立法，尤其必須見

於認真的實行。因為，一個國家的組織機能的完全與否，其表現就在於對外能抵抗他國的侵凌，對內能保護最弱而最需要保護者的權利。目前世界上文明國家的進步的程度，很可以拿它們社會政策中對於婦女兒童的保護的程度為證明的。

在幾年前，我國於國民革命的進展中，各地都有婦女協會的組織，一時保護婦女和兒童的事業似有勃興的氣象。當時所謂保護的含義是很廣大而積極的。但在不久以後，婦女協會化為婦女救濟會，在事業上就被限為完全消極性質的救濟，而非積極的保護。到現在，連這種救濟會已很少聽到。社會上偶有聽到關於救濟婦女和兒童的事件，乃是被虐待壓迫的婦女兒童因苦極無可忍受，投向執法者請求救濟，或旁觀者因不忍而代抱不平，向執法者代求救濟；但就在這種情形中，執法者的辦法常常是僅限於依法警誡虐待壓迫者，並沒有設法救濟被虐

待壓迫者，使她們脫離痛苦的環境。至於從災亂之區逃出或被運出的婦女兒童，則全無具體的救濟或保護辦法。在社會上，似乎有些地方還有慈善性質的所謂救濟會，比較有組織的是教會性質的節制會所進行的婦女救濟工作，與慈幼會所進行的兒童保護工作。但這種機關限於經濟的能力，在規模和作用上都不能與國家所主持的具有相等的意義。總之，在目前，我們覺得不幸的婦女和兒童似乎是在猛烈的增多，而救濟和保護則祇見減少下去。

幾年來偶見地方機關有禁止販運婦女和兒童以賣淫或充作體力奴隸的命令，但其效力僅止於紙面的規定；工廠法中的女工童工保護條例施行已久，能照辦的也不見得多。但在最近，政府着手起草憲法，其中關於「人民權利問題」的各條，雖然沒有十分表現出兒童應得的權利，而對於婦女的權利則有很新穎之點。例如第二十三條「爲母者有受國家保護及扶助之權」；第二十五條「未

成年之青年男女有受國家特別保護及扶助之權」補充第一條「婦女在生產前後及哺乳期間依法受國家特別保護及扶助」等等，都是能代表實行保護婦女的社會政策的特色的。再如第二十四條「非婚生子應受國家之保護」也可代表對於保護兒童的一大革新之點。憲法的草定我們認爲是一件大事，這種條款是希望它們能真正施行的。

關於兒童的教育，憲法草案中祇有「人民有教育子女之義務」而沒有標明國家應負更大的教育的責任，我們認爲是一種缺點。國家擔負兒童教育的制度，在目前已成爲普遍的趨勢。在實行進步的社會政策的國家，政府不僅負擔兒童的教育，而且注意到兒童的健康，心理發展以至其他各種社會權利的保護。從注意於兒童的保護，許多國家更把注意推及於產生兒童的母性的保護；因爲保障母性的健康即所以保障兒童的健康，就在教育上，給母性以良好教育也即所

以改進兒童的教育環境。我們以爲，正在從封建的形態中蛻化而進於近代的新國家的我國，對於這種保護婦女兒童的進步的社會政策，是值得而且必須採行的。

如果有人以爲在目前的民窮財盡的時刻，我們國家不應負擔這種需要大量金錢的事業，那麼，我們應該指出，這國家有許多糜費的經濟是應該用到這種造福於民衆、造福於種族後代的社會建設事業上的。我國每年以無限大的負擔消耗於軍隊的供養，有許多不生產的事業侵蝕着可以善用的經濟，目前所需要的就在轉移這種糜費以興辦有益的事業。這裏我願將英國羅素的一段話來勉勵我們國家。羅素在他的教育與良好生活一書中論到英國的嬰兒學校事業，說：『根據一九一八年的教育法案，英國的嬰兒學校是應由政府出資興辦的；但是後來決定還是認爲造兵艦及建築新加坡軍港，比較興辦嬰兒學校來得重要。在

目前，政府每年寧可虛費六十五萬金鎊，使國家喫殖民地的隔宿的牛油以中毒，而不願喫丹麥的省錢而新鮮的牛油。在這種情形下，我國的兒童所受到的影響，只是疾病與困苦；若不是這樣，則每年的六十五萬金鎊可興辦多少嬰兒學校，以造福於兒童呢？』我們的意見是，我國政府如果不願學英國的榜樣，則應學較好的榜樣。

我們的第二層意見是要對目前國內的智識婦女說的。幾年來，我們曾經見到不少婦女提出「婦女應該學些什麼？」的問題。有許多婦女在學校學得了些空洞的東西，在離校後發生了所學無所用的感慨。關於這種情形，我們應當指出的，就是在母性和嬰兒保護的方面，目前我國的婦女有着許多切實而重要的知識技能可以學習。這意見我們可以舉出環境上和理論上的同樣重要的理由。

在環境上，正如我在本文開首所指出的，我國的婦女和兒童現在正陷於極

大的苦難中，而急待切實的救濟與保護。當然，在人權方面的缺陷，應由我們國家的政府從事根本上的補救；但在物質和文化方面的苦痛，是一般沒有喪失同情心的國人所應共同救濟的。這種救濟不重在暫時的捐輸，而在有計劃有組織的改善災難中的婦女兒童的生活狀況。不僅是災難中的婦女兒童應該救濟，就是一般困頓於低級的文化 and 物質生活狀況中的婦女兒童，都應受到注意。如何使我國的婦女在擔負母性的責任時能得到良好的保護？如何使母性和嬰兒的死亡率能夠減低？如何使婦女的母性疾病能得到良好的診視？如何使做母親的和兒童能受到適宜的教育？如果目前的智識婦女想要解答上面的問題，那麼，我以為最好的答案，就是她們應該儘量學習關於母性和兒童保護的科學。

目前有許多婦女在學助產科學，有許多在研究兒童教育；這些學習研究的方向我以為是非常適當的。從我國的現狀觀察過去，我們可以斷言，在最近一般

婦女和兒童將繼續受着像目前的或較目前的更甚的苦難。所以救濟和保護真是急不容緩的事。然而就在我國的社會情形逐漸轉向好的方面時，婦女兒童的保護的需要也祇有加甚，不會減少的。我們祇要想，如果將來中國已進步到各地有母性醫院，嬰兒院等等保護母性兒童的機關時，在這種機關服務的，除了國內的婦女，還有誰呢？

至於在根本的理論上，我們也應該指出，對於婦女和兒童保護事業，婦女實在是最適宜的負責者。目前各國的婦女兒童保護事業，都有婦女作負責的指導者。有不少婦女是以努力於母性保護或兒童教養事業而著名的。美國的兒童部長是有名於兒童事業的愛波脫（Grace Abbot），美國的山格夫人，鄧耐脫夫人（Mrs. Mary Ware Denett）和英國的斯篤潑斯女士（Mary Stopes），都是以從事母性保護的研究和實際事業而著名的。而最最值得人欽佩的麥美侖女士

(Miss Mcmillan) 乃是目前世界最努力於嬰兒教養運動的一個。僅是這些實例，已經能夠證明給我們婦女與母性兒童保護的重要關係了。

我不想再多寫下去。從前面的文字中，我希望讀者能夠認識到我國目前的婦女兒童保護問題的嚴重和迫切，我希望政府能覺悟而從紙面的立法進為實際的救濟和保護，我更希望婦女能認識她們本身在這問題面前的重要責任。

有人說，十九世紀是婦女的時代，二十世紀是兒童的時代！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去趕上這種重要的時代潮流呢！

職業與母性

碧城

一 婦人職業與幼兒生命

在婦人問題上，母性問題的發展和婦人參加工業勞動數量之增大有着特別密切的關係。婦人們在社會上和一切的勞動每更接近一步，則在她們自身便跟着增大了母性和職業兩種義務間的矛盾。現在無論什麼工業勞動，差不多都已許可婦人參加；初期的男女同權論者所夢想企望的，現在已完全見於實現了。在婦人們的眼前，各種的職業都開着大門在招引牠們；但在這種大門的背後，則展開着幼兒墳墓的數目。

在歐洲諸先進的工業國間，當本世紀之初，就差不多有六千萬以上的婦女參加於各部門的生產勞動中。例如，奧國當時參加職業的獨立婦人竟佔婦人總數的百分之四二·八。這種職業婦人中，大部分是既婚婦人。據調查，奧國工業，農業，商業上的既婚婦人，共佔該國獨立婦人總數百分之四八。這種種作業大部分都是帶着絞榨汗水性質的勞動。而且，跟着工商業的進步，這種勞動大都是在離開家庭的工廠或大商店中工作的，以是參加職業自謀獨立的婦人就沒法兼顧她們家內的幼兒。婦人勞動繼續不斷地普及，參加職業的婦人對婦人總數的百分比比現在正日益增高；這事實和現下各國幼兒死亡率之昇騰，當然有着密切的關係。母性問題的嚴重性在今日已成爲非常明顯。

實際上，職業婦人中既婚者的數目，比之統計所顯示的還要大得多，因爲普通的統計大都僅將合法的結婚者計入；一般因爲參加職業而作非合法結合的

婦女爲數亦復不少。在婦女最守本分的德國，每年差不多有十八萬以上的私生兒。母性問題在這裏就更含有重要的意義。

勞動者生活之一般惡劣條件，影響到他們幼兒死亡率的昇騰；而婦人之參加職業的雇傭勞動，對於這一現象尤能引起重大的作用。這對於生產延遲和幼兒死亡兩方面都有直接的影響。這種新的矛盾——起於母性的本分和婦人職業間的矛盾，是從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內產生出來的。在現存的個人主義的社會組織中，母性和獨立勞動者相併合是不是有利呢？我知道誰都將加以否認。由此可知產生於現代的母性問題，是和現代的勞動及生產問題相關聯而不可分離的。

在男子們以其自身的筋肉勞動從事操作來養其妻和子女的時期內，母性問題是不會有的。但自從生產界起了革命，開始將婦人的勞動力捲入的時候，職

業和母性間的矛盾就跟着呈現出來，而且社會上對此也就顯有要加以干涉的傾向。在歐洲當第十二、十三世紀手工業已發達，婦人勞動廣大地被使用的時候，婦人的本分和職業勞動兩者間相抵觸的直接結果，早就反映於她們子女的身上。當時參加生產勞動的婦人的幼兒，比之不從事手工業的隣家女所生的幼兒特爲虛弱。於是在一二九〇年，法國某毛氈織工團體的決議中就有了對妊娠婦人不可使之繼續操作的提案，其理由是妊娠婦人如果再從事繁重的手工勞動，則無論對於胎兒或對於母體都會發生有害的影響。

生產技術之長足的進步，使婦人勞動力的被榨取亦較之早先顧慮到家庭形式的時代，更進一步。這便是將婦人們從家庭內驅逐出來。在手工業時代，婦人勞動力雖一樣地被雇用，但爲母親的還不是全然離開了她們的幼兒，還未曾完全解脫了家庭的羈絆，也不是從家庭內將婦人們放逐出去。在不妨礙工作的

限度之下雖然她們須要勤勞操作但仍可偷閒來撫幼兒，理襁褓，以及監視小孩們的嬉戲。

自此以後，資本主義的工場生產就急激地展開。在這種工場中，爲母親的每天總是離開了家庭及其幼兒，僅在每晚上歸來匆促地整理家事之暇，纔照顧到幼兒們。爲了背負着職業勞動的重任，竟使自己的子女日迫於墓地。健康的壯年女性之自然的職能，已完全給一家的生計剝奪去了。工業生產愈急速地發展，參加勞動的婦女人數也跟着增多，那從母性和職業兩重負擔不能兼顧而產生的矛盾，便更增加了婦人們的苦痛。在現社會的經濟組織下，婦人們不但在育兒上和職業上兩受損失，而且婦人們對於後代種族所負的本能的力量，亦常常被粉碎無餘。有許多爲母親者，爲了圖餬口計，竟在職業的重負下置她們的子女於死地而不自知。而且一成爲被雇傭的勞動婦人，便已喪失其進行母性的自由，甚至

於迫於飢餓而工作，有時候竟使胎兒被磨折而死在腹內。

二 惡劣勞動條件之殘害母性機能

到底那種力量將成千成萬的婦人驅逼到工場製造廠中去呢？到底那種力量使廣大的婦人們將雇傭勞動職業看得比母性更重要呢？不消說，這種勞動的試鍊一半是由於自己要謀獨立的憧憬而來，但是，繁重的家計，貧乏，以至自身和家族贍養之必要等等，卻都是促使婦人離開家庭而進入工商業勞動中去的主要原因。據法國的調查統計，在獨立的既婚婦人中，有百分之七一到九七是因爲貧乏而進入工場中的。

即使職業勞動能將婦人的經濟狀態改善到某程度，而在現社會組織之下，職業與母性間的未解決的矛盾，仍然會引起母性問題之產生。這一矛盾實際上

還超過我人意想以上的深刻；這是應着母性的本能義務和婦人在家庭以外勞動間的時間場所上的矛盾而產生的。榨取雇傭勞動者的經濟組織對於婦人們所課的工業勞動，就生理學的觀點看來，是完全將婦人之所負的自然的使命——婦人成爲人母的可能性——根本地給摧殘着。這種重壓不但使婦人們的生育數目減少，而且使婦人所生育的種族成爲羸弱。

在製造廠，工場或商店內的婦人作業大都是非醫學的，不合衛生條件的，這是一般共知的事實。長期間的直立，或在不通風的空氣混濁的地方灣着背俯坐十二乃至十八小時，粗惡的食物，睡眠不足，繼續不斷的疲勞等等，這些都是職業婦人生活上無法避免的。加之，有些工作還需要搬運笨重的物件，吸入毒質，這對於婦人身上諸器官都能給以不良的影響。其結果遂使職業婦人們的身體——具備母性諸機能的正常的婦人身體——漸陷於虛弱的，病態的境地。

欲使婦人的機構得有正常的發達，則處女在成人期內應受到特別周到的監護指導，使她們能在健全良好的條件下發育長成。但這種要求在勞動階級的處女之間是完全不適用的。在目前一般勞動者的家族內，爲了補充其兩親收入賃銀之不足，十二歲乃至十歲的幼女大都被迫進入各種的工場職業內。種種的肉體勞動使這些未成年少女的身體機構陷於虛弱。惡劣的勞動條件阻礙了她們自然的發育。永續的睡眠不足及僅免於饑餓的食糧，足使這些處女們易患貧血症，其結果遂無可避免地種下她們性病的根源。

婦女一入於青春期，她們正在發育的身體機構特別易於感受疾病。據各醫學者的調查，在青年男女中，從十四歲到十八歲之罹性病的，百七十四人內約有百人。許多醫科專門學者都在他們的著作中主張爲未來的母性健康計，應使將屆成年的處女受到比現在的更周詳的保護。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內，雖然也承認着這種醫學上的缺點，卻仍漠然地置婦女一生的最緊要時期於不顧，而盲然地行使妨害婦女們的母性機構的規制。母性在工場或手工業勞動中發育被損害的事實，在各國的官廳統計上很明顯地表示出來。據一般統計所示，在結婚前就參加勞動的女子的幼兒死亡率，比之結婚後進工場的女子的幼兒死亡率，約增高百分之十七。假如一個青年婦人已經懷妊而進工場，那更必然地要招致很悲慘的結果。背的屈曲，胎盤等的不正常發達或變態，像這等等，對於婦女本身和胎兒都有不堪設想的惡影響。柏林醫科學校附屬醫院內的婦人科醫生許脫拉斯曼博士，根據其多年的經驗，曾下了這樣的斷定，據說不僅是女工，就是做家庭手藝的女人，因為資以餬口的工資太少，亦大都欲避去為人母的重負。結果許多的次代的國民就被這現代的雇傭勞動的不規則條件所犧牲。又據他的調查，在女縫工內，有百分之三十七都害生殖器變

態症，有百分之二十三成爲子宮中性者，有百分之十八患子宮炎症。在她們間差不多有百分之十三患流產，百分之十患變態的生產。在一般女工中，不妊，流產，死產，或產婦身亡之類，更是非常的普遍。

在各國，據專門醫學者的調查研究，都承認在女工們之間患生產不能者的數量，日益增大。據柏林各醫院的調查，在一百個就醫的婦人內，至少有十人是患着關於生產的疾病的。各國幼兒死亡率之增大，和流產的普遍，很有關係，而流產又是和婦人的職業勞動的過度操作不能分離的。在工場內，有些技術的操作或製造品的化學作用竟會斷送在母腹內的胎兒的生命。據哈蒲爾金氏的調查報告，在歐洲富裕階級的婦人內，患流產的爲百分之九·一七，患死產的爲百分之九八·五；在勞動階級的婦人內，則患流產的占百分之十七·八九，患死產的占百分之三二·五七，即比之富裕階級約增加三倍。特別是那些有了妊娠而尙從

事於水銀，磷，銅，鉛等工業的勞動婦人，經過了幾次流產之後，她們必將成爲妊娠不能者。

在現代各工業國內，流產和死產的數率莫不顯著地增高。在法國，因爲流產和死產之普遍，每年在產兒總數內差不多常損失六萬人以上。在德國，據諸病院中計算，流產和死產約占全部產兒百分之十五。流產，特別是未足月的胎兒之生產或死產，和婦人職業勞動的狀況有極密切的關係。職業勞動對於臨月的妊婦更爲危險，母子的生命往往被決定於妊婦在產前二週間之是否得着休息。在這決定母子生命之最後的十四日間，婦人的機構漸趨於適應她的最後的目的，而且決定了幼兒出現於世之最適合的狀態。假如這時候有外部的不利的影響——妊婦的過勞或對於生產有害的勞動——足以破壞這偉大工作，則母親和嬰兒都將陷於險境。

三 產前產後休息之必要

據母性保險主張之最初擁護者路易法拉格的報告，在當時歐洲每年就差不多有三十萬以上的婦人爲生產而死亡。這大量的次代國民的母親的不必要的犧牲，大部分是資本主義的畸形的社會生活所招致的。在婦人職業勞動更普及的國家內，莫不顯示婦人由生產而死亡的高率。

產婦的一般致死原因，大都由於雇傭勞動的不良狀況而來，這可由諸病院的調查統計而下斷定的。假如她自身是一個職業勞動婦人，那末，她要完成她自身的天職，就不能不拿她的生命來賭拼。

損害婦人健康的，不僅只是一般的惡劣勞動條件，對於妊娠與生產時的勞動婦人之不給以保護，也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嚴重問題。在前世紀的八十年代，

一個工場監督者耶喬里早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一般上，因為婦人有着比男子特易感病的機構，所以工場勞動上之一切有害的條件，對於婦人健康上的影響亦特別見得強而有力。例如，長時站立的工作或用足勞動的工作，在某限度內對於男子勞動者是無害的，但這些工作對於婦人則每易影響到她們的健康，使她們的身體機構蒙受損失。特別是妊娠中的婦人，尤其危險。』

婦人在生產前後從事於職業勞動，對於母親自身及其胎兒或幼兒都屬有害，這已是醫界上誰都確認的事實。不過對於從事職業勞動的母親，應給與休息的規定期間的長短，在各醫學者間稍有意見上的不同。有些人謂在生產前後應有六星期乃至八星期的休息，其他的則主張應給為母親者休息七個月乃至一年。

據婦人科醫學者代表的意見，謂婦人在產前至少要給以四星期，在產後至

少要給以六星期的休息。因爲子宮在產後的第二個月纔能恢復其常態，所以在產後如勞動過早，則易起子宮下墜，出血或炎症，有時候或竟因此而罹慢性的疾患，以致損害她們本身的機構，甚至於會引起妊娠不能及精神病。

但在現社會的制度下，勞動婦人有多少能享受這種必要的休息呢？一般的勞動婦人在生產前後大都困於貧乏，僅能在紛亂囂雜的家庭中或下等的產院中臥息五六日，即被迫而開始其作業，她們是沒有工夫來考慮她們自身的一切的。於是種種有害的影響就在她們自身上及她們的幼兒身上反映出來，不消說，那結果常是可悲的。

據上所述，可知母性問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方日益加增其嚴重性，所以這問題在各國也曾引起了立法家的注意。不過各國之所以注意這問題，大都是以

國家的見地，即從希望人口增加的立場出發的；因為母性的受難不僅是爲人母的婦人們自身受損失，並且將聯帶置她們的胎兒或新生兒於死地；這些幼兒們正是他們國家之未來的捐稅負擔者，生產勞動者，戰爭時的服兵役者。爲了這，所以纔有保護母性的施設。這離真正爲母性及幼兒謀幸福的路途還很遠。實際上，母性的運命是和全人類的運命有直接關係的。母性在現社會集團之前既獲得其明確的社會價值，則對於這一問題的檢討，就非從整個社會組織去認識不可，因此，這問題的解決也和整個社會組織的改造有密切關係的。

國難聲中之兒童教養問題

林仲達

一 兒童教養問題的嚴重

誰都知道今年的雙十節所以停止國慶紀念，是因為國難嚴重的關係；然而國難的真正嚴重性，倒不在於國慶紀念的停止與否，而在於那整千整萬呻吟悲哀於饑饉和礮火中的次代民族的教養問題。

我們從這次民族戰爭的教訓中，深深地感覺到國家每年負擔佔國庫總支出半數以上的軍費所養着的二百多萬兵，他們決不會解除被壓迫民族的苦痛，而只有使被壓迫民族的苦痛加深，使次代民族的教養問題益趨於嚴重。這是中

社會所特有的現象無容諱言的。

青年婦女們，你們對於兒童教養問題比男子有更深切的關係，你們負有再造中國民族的偉大使命。你們對兒童教養問題該有一種新認識，由此找尋今後婦女運動的新路線，以達到全中國婦女的解放。

中國今日兒童教養問題的嚴重性可從下列諸現象中反映出來：

1 社會經濟的崩潰——「九一八」的國難，是任何有血氣的中國人所痛憤而且永遠不忘記的；但有人能知道這次國難對於中國民族的生存上的打擊，畢竟到怎樣一個程度嗎？佔全國總面積十二分之一的三百二十六萬二千七百萬方里的土地的喪失，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的三千萬同胞之淪亡於奴隸的悲境，固不必說，而且不忍說；單就經濟上的損失而言，則有佔全中國內部輸出總值六萬萬六百萬海關兩之百分之四十八以上的東北農產物的損失，「九一八」事

變官方總計一百七十八萬萬元的損失，「一二八」滬戰官方總計十六萬萬元的損失，（註一）這種經濟上的打擊，實已足直接置中國民族於生死線上，而間接更予中國社會基礎以絕大的震撼。

同時，中國今日農村經濟實已陷於破產的狀態。一九三一年入超爲五萬萬四千餘萬兩，而以農產品爲大宗。本年（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入超又爲三萬萬八百餘萬兩。民元已來，無年不入超，截至二十年止，入超已達三十九萬萬一千二百餘萬海關兩，（註二）這樣驚人的數字，反映到民生的凋敝，已有不堪言狀之慨！

然而國難未已，內戰又起，首有粵亂，繼有魯亂，近復有四川 劉的戰爭。中國自一八六二年至一九三〇年間，七十年來內亂共有一百十七次，時期歷五十二年之久。（註三）內亂的損失，勢必取償於民衆，自民十六至去年間，政府發行國內公債的總額爲八萬萬九千九百萬元，如此鉅大的債額，雖直接募自銀行，間接卻

來自民衆。不僅如此，各地方政府的苛捐雜稅，更是洋洋大觀。

由此，可知帝國主義的經濟的侵略和中國的政治的不良，必然地致中國社會經濟瀕於破產，而使中國次代民族教養問題，益趨於嚴重。

2 貧窮人口的累積——中國今日貧窮人口的增多，是很顯明的一種現象。據友人古棣君調查，人口總數在一萬萬以上之統計，無業者竟有一千六百餘萬，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二四，差不多是四分之一，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都市的增加較農村爲更甚。若照陳長蘅氏估計，民十七全國人口總數爲四六〇、五一〇、〇〇〇人推算，那末，無業人口便有一一二、八七二、〇〇〇人，簡言之，即四人中便有無業者一人。（註四）據十七年十一月北平貧民之調查，貧民數共計二十三萬四千八百人，佔全市人口五分之一，若以十七年夏間各省區貧民數統計（蒙古西藏除外），則貧民數爲一萬萬另三萬九千餘名，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一以上。

又據李敬穆氏調查的結論：全國貧民有二萬萬人。（註五）

美國 Malory 氏在他所著的災荒之國（China-Land of Famine）裏面說，由紀元前六二〇到一九〇〇年，在中國共有包括整個幾省的災荒一千五百〇六次。（註六）可是自民國以來，災荒更頻繁地，更深刻地，更廣汎地抓住了中國的農民大眾。水災在一九二七年及一九二九年發生於中部，一九三〇年亦在中部發生。一九二八——二九年西北大旱災，一九三〇年還繼續演其餘波。依據估計，一九二七年的災民約有九百萬，一九二八年三千四百萬，一九二九年五千四百萬，一九三〇年三千萬。一九三一年的大水災更表現為這饑饉過程的最高點。（註七）

這次水災難民共計一萬萬，其中一千萬為赤貧無力須待救濟的。其已入收容所的，上海的六千餘人，兒童已達千五百名以上。其他武漢約二十萬，兒童在五萬以上；蕪湖約八萬，兒童在二萬以上；江北約五萬，兒童在一萬三千以上，至於

沒有收容所的更不知有多少？（註八）

中國今日有這許多的失業者 and 災民羣衆，他們連自己的生存權尙成爲問題，如何顧到他們的兒童的教養。

3 飢寒程度的尖銳——國際賑災委員會曾經考察中國四省二四〇個鄉村農民收入的狀況。（註九）在直隸省考察了八十五個鄉村，居民總數爲二五、八八五人。據說家庭總數的百分之八二·五是生活在貧窮的最低限度以下。在江蘇調查了有六、八七〇個居民的四十二個鄉村，結果全家庭數量的百分之五二·一是生活在貧困的最低限度（百五十元）在安徽考察結果與江蘇相近，在浙江考察有居民一、四四四人的六個鄉村。素稱「富庶」的浙江，其鄉村居民的百分之六四·三係生活在窮困的水平線以下，其他陝甘各省，不問可知了。

北大社會學教授陳達氏研究了陳伏和胡卡兩個鄉村，曾作以下的結論：對於五口之家的生活最低限度，在陳伏村每年爲百三十元，而在胡卡村爲百五十七元。在陳伏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生活在此種貧困的最低限度以下，平均全家每年工資爲九三·一一元。而對於窮苦的平均還差四一·八八元。在胡卡村，在百五十元的生活的最低限度之下，八十一人中有六十五個，亦即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百二十元以下的工資。平均全家的工資爲八八·八〇元，平均還差六八·三〇元。（註十）

中國的農民是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但由以上事實可以確定中國今日的農民和雇農的家庭的百分之五二至六四是生活在貧困的水平線以下，而在遭遇自然貧困的區域甚至到百分之八十。他們終年以汗血所換來的代價，尙不能支持其生命所需求的最低限度的食品的热量。

據燕京大學農村經濟學系教授泰拉 (J. B. Taylor) 調查華北五口的農家，每年開銷一六〇元的生活費，各種食料所產出的熱量僅有一三、六八三卡羅利，平均每人不得過二、七三七卡羅利；而鹽山農民也僅得二、五九八卡羅利，(註十二)可是離開標準熱量(三、〇〇〇卡羅利)還很遠呢！

我們試把八九九個中國農家疾病費與四七二個美國農家的疾病費的百分比來比較，則前者爲〇·六，後者爲五·一(註十二)據此推論，中國的農民倘遇疾病，只有待死而已！

雖然，工人的生活或許好些，讓客觀的事實來告訴我們吧。據上海社會局調查，上海全體廠工有二三七、五二二人。平均每家每月總收入爲三二·八九元，平均每家每月費用爲三二·五〇元，出入僅足相抵。(註十三)在這樣生活無保障的現制度下，他們隨時有加入失業者的隊伍裏的可能；到那時，其子女的教養狀

況又怎樣呢？更就上海工人的衣食住生活而詳細分析之，他們家庭的膳食滋養成分統計的結果，平均每日每等成年男子得蛋白質八八公分，脂肪四九公分，含水炭素五·三一公分，發熱量二、九一三卡羅利。其熱量雖勉強近於公認的標準，但大部分來自一般植物食品，脂肪分量太少，而含水炭素分量則太多。他們所穿的衣服，大部分是粗布和洋布。倘依全體家數計算，則平均數每家全年不過分攤很可憐的二·五六尺哩嘍，四寸華絲葛，四寸一分的綢子的而已，如此數量若嫌太奢，除非返於原始時代之裸體生活了。他們的住房大都一間者幾及三分之一（百分之六二·六），一所房中同住的家數常有三家之多。甚至有兩批工人日工和夜工對換，一室之中，經常充滿着炭氣。

據美國 Pennsylvania

美國兒童局的約翰城分部的調查，健康和住房的

關係如下：（註十四）

兒童死亡率(每千人計算)

關於飲水
家中有自來水 117.8

用家外運來之水 197.9

關於燥溼
乾燥之房 122.5

潮溼之房 156.7

關於廁所
用家內廁所 108.3

用家外廁所 159.3

空氣的流通
兒童睡眠於空氣流通之室者 28.1

兒童睡眠於空氣不流通之室者 169.1

再看 Dr. W. L. Mackenzie 與 Captain Foster 所作蘇格蘭七二、八五

七個由五歲至十八歲學校兒童體格與住房大小的關係的調查,其結果如下:

童 女		童 男		住庭家 數間房
高體均平 (寸英)	體均平 (磅)重	高體均平 (寸英)	體均平 (磅)重	
46.3	51.3	46.6	52.6	間一
47.8	54.8	48.1	56.1	間二
49.6	59.4	50.0	60.0	間三
51.6	65.5	51.3	64.3	上以間四

關係，何怪乎中國今日一般兒童身體的健康和體格的大小，與家庭住房既有這樣密切的

4 童工待遇的殘酷——產業領域上自有童工制度出現以後，無數幼弱心身的兒童在勞動工銀制度之下過其慘酷的生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最近調查的童工數目：童工總數凡十六萬九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中十三歲以上的男童工爲四萬四千四百二十五人，女童工爲十萬另三千二百四十一人，共計十四萬七千六百六十六人；十二歲以下的男童工三千七百七十四人，女童工爲一萬七千七百零四人，兩者共計爲二萬一千四百七十八人。這僅就租界而論，未見絕無遺漏，若連租界以外各區列入，數當更大。單單上海一區就有二十四萬以上的童工，幾乎要佔全上海產業工人四分之一。（註十五）

據古棣君所調查，各地童工人數（二五、一三七人）佔全體工人（二三七、五七〇）百分之三〇·三。（註十六）其他商店作坊的學徒，沿街叫賣的小販，幫助老農的幼童，又不知有多少？我們再來看看各處童工生活的苦況吧！

滬、粵、津、漢各地工廠童工生活表（註十七）

機 器	火 柴	烟 草	纜 絲	紡 織	工廠類別
上 九歲以	全	全	全	以上 七八歲	年 齡
9-12	10-13	9-12	10-13	12小時	工 作 時 間
?	·112	·15-·30	·15-·25	·15-·30	工 資 元
	裝置火柴 工作及在家 糊火柴匣子	較好	站立煮繭易致 疲困手浸熱水 常被燙傷	日夜站立工作 夜間常有隨地 倒臥者	工 作 狀 況
空氣滯悶 陽光不足	不致病傷 慎發火	煙氣刺鼻 為害嗅官 及肺部	潮溼較重	棉維飛揚	衛 生 狀 況
大都採用學 徒制故無工 資	以下四業皆 有六歲以下 之兒童隨母 工作		多有吃飯不 停者	晝夜輪班俱 有童工	備 註

勞動工人爲飢寒而出賣其每天十小時以上之勞動力，尙不够維持他一家
的生活，還把他的甚至不及六歲的幼兒來供驅使，人間還有所謂平等嗎？

5 死亡率的升高——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文化的高低是和牠的兒童死
亡率適成反比例。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各國嬰兒死亡率（每千人計
算）約如下數：日本一八九，德國一四五，意大利一三九，法國一一九，丹麥九二，英
國八九，美國八七，瑞典七〇，挪威六四，紐西蘭四八，印度六三〇，中國二五〇。近幾
年來各國因醫學的發達，衛生智識的普及，嬰兒死亡率更有降低之趨勢；而中國
則反是。「各國每千嬰兒中死六十九人，而中國每百人中死五十人，江北人竟死
至七十五人。」（註十八）據馬札亞爾在其所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裏說：『中國人
口所生殖率比世界任何國都要低，根據一切事實統計以及調查統計都是這樣。
中國人口的死亡率是比世界任何國都高。北京每年的死亡率男人到了千分之

三十三，女人是千分之四十二。上海泰晤士報曾公布中國死亡率，說：平均每年千分之三十。（註十九）（英國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一〇・四）把中國與普通的文明國死亡率相比較，即每年還多死六百萬人，患天花死的有九十萬人。』

據十七年廣州市市民生死調查統計報告，從八月起到十一月止，每週總是死亡者超過於出生者，平均每週減少六十七八強。又據南京特別市公安局衛生處調查市民死亡統計報告，（從十七年一月起至十一月止）平均每月也多死二百七十一，計死者為出生者之四倍強。（註二十）我們原不必神經過敏，推論到幾百年之後，中國民族將要滅絕，可是根據各種統計，中國現在死亡率確是有特別高於生產率的趨勢，尤其是嬰兒死亡率比任何國都來得高。假使「每百人中死五十人」的統計材料是正確的話，那末，這些驚人的數字很足以反映出中國民族前途的危機，換句話說，不知有多少未來的中國愛迪生和血戰抗日的健兒，早

已埋葬在這些數字裏面；任憑你用什麼智力測驗，恐怕度量不到畢竟誰智誰愚？豈僅嬰兒死亡率的增高，就是中國產婦的死亡率也是大得可怕！全世界產婦死亡率以丹麥爲最少，一千人中只二人，日本三三人，意大利三七人，英國威爾斯三八人，德意志五一人，紐西蘭五一人，美國七一人，而中國一千人中死亡計一百七十六人。（註二十）這非但是婦女們自己的重大的犧牲，而且是中國整個民族的文化上的無限損失。

6 失業兒童的增多——中國今日貧窮人口之膨大和饑寒程度之深化，一般被壓迫民衆欲求生活資料之最低限度而不可能，還有什麼餘力來教育其子女？上海工人平均每家全年教育費爲七角七分。十八歲以下兒童之入學者，男的僅百分之一五·三，女的少至百分之二·一；換言之，男童有百分之八十五未入學，女童百分之九十八未入學。（註二十二）南京金陵大學卜凱（Book）等調查中

國七省十七處二、八六六農家的教育狀況，就全體說，未受教育的有百分之五二·二，而學齡兒童失學的則有百分之六九·六。（註二十三）

首都爲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受教育的兒童應該比較多些，但是事實不然。據二十年南京市教育局調查學齡兒童數目，其總數爲五萬七百三十三名，已入學者爲一萬七千八百四十四名，未入學者爲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九名，平均計算每一百個學齡兒童當中有六十四個沒有讀書。首都尙且如此，其他教育不發達的地方，便可想而知了。最近教部調查中國全國學齡兒童共四千三百六十萬餘人，已入學者僅六百四十一萬人，未入學者有三千七百十九萬人，這是一般以高學術爲名而分肥庚款其實的教育學者（？）所應該注意的啊！

總之，生活於貧困水平線以下的過半數的中國民衆，他們所需要者固然在於簡簡單單的衣食住生活，但是國家對於富有者的子弟則與以大學教育的特

權；而對於貧寒者之子弟甚至連所謂「義務教育」亦不令其充分享受，所謂「教育機會均等」也不過是一句騙人的空話而已。

二 教養制度的改造

中國今日外禍、內亂、酷政、匪患、災荒，一切的一切，致中國整個社會經濟已呈顯破產的狀態，使大多數被壓迫的下層民衆生活於窮困的水平線下，直接間接都會影響到次代民族的教養問題；同時必然地使今後中國兒童教養制度需要改造，雖然這改造的具體方案，是和其他政治經濟等制度的改造相關聯，而且須經許多人長期間的精密考慮，可是其改造的基本原則，大體不外如此：

1 從「兒童爲雙親的私有」到「兒童爲全民族的所有」——在原始社會，兒童的地位雖然很低，但他不是屬於雙親而是全民族的所有，民族全體負有

教養兒童的責任。到了現在，兒童的社會地位已由被殘殺虐待進至被憐憫和同情，更進而至於被重視和尊崇；但兒童私有的觀念卻非常的濃厚。因此，兒童的教養權利遂被物質的經濟條件所決定。你有所有權，你便享有教養的特殊權利；你一無所有，也就命定地陷於飢寒和無知的悲境。

今日中國民族的生存已到了一個極危險的時期，我們要謀中國民族的復興，不能不對那爲新中國的骨幹的大多數被壓迫的兒童加以注意。日人礮火下的難兒，漢口水災裏的災童，以及整千整萬的啼飢號寒和無知無識失學的的貧兒，這些，決不是「他們的」兒女，乃是我們整個民族的後裔；我覺得個人是依存乎社會的，是藉他所生活的社會而成長的，因此，我主張今後中國的兒童決不是他的雙親的兒童，而是屬於社會的或國家的。我們對於次代民族的教養，決不能有如下這樣狹隘的差別觀念的存在：「這是我自己的兒女，對於這些兒女，我要

教養他們。那是你的兒女，他們的兒女，用不着我去關心。——今後，我們須具有社會連帶責任的觀念，應自覺自己的社會職分，是整個中國民族的父母。另一方面言，一切兒童只是中國整個民族的兒童，任何父母既不能視兒童爲雙親的私有財產，有時爲飢寒的條件而可以漠視虐待或出賣他們的兒童；同時也不准有些父母立場於個人主義來教養其子女，任他們在兒童的心理內印下不自然的界限觀念。

婦女社會解放之先決問題是在從家庭的勞役中解放出來；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是我承認民族教養的偉大工作，至少和其他勞動是具有同樣的意義和價值。今後母親的育兒不算一家的私事，而被認爲社會的公務，決不是像一般自命或被稱爲解放的新婦女所視爲一種勞役或賤役。婦女解放的真正目的決不是把自己的鎖鏈加到其他大多數貧苦的勞動婦女身上。更不應像有些所謂兒童

教育專家，利用什麼科學方法來檢驗奶媽的體格，剝奪其他貧苦兒童的生命的資料，來哺養自己掌上明珠的「好寶寶」；這些不僅是基於兒童私有觀念的缺陷，而且是人間極不合理的一回事。我們必須記住，今後不應有自己的兒女的觀念，只有全中國民族所有的兒女的概念。我們須本已飢自溺的精神，集中全民族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力量，從全民族的共同教養工作中，來解放一切婦女。

2 從兒童教養費之個人的負擔到由國家的或集團的支給——雙親產生兒童，對於社會國家不能不說是盡了很大的義務，但是實際上也是雙親很大的苦痛負擔。今日中國的民衆大半生活於貧困水平線之下，如何能擔負得起子女的教養費？而況因時代的推進和社會狀態的變遷，兒童的教養已具有社會的意義。他的教養費也有漸次移於社會負擔的傾向。勞働國家的蘇俄固不必說，它完全承認國家有教養兒童之權，故兒童的教養費全由國家負擔。就是其他如美國、

加拿大、丹麥、紐西蘭等國，政府對於寡婦及丈夫不能擔負養育費的，則有母親扶助法制度，以充兒童養育費；像法、德、比、荷等國則有家族津貼或家族工銀制度以充兒童養育費，這都是由父母與國家共同擔任養育之例證。（註二十四）我們深知道今日中國國家財政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境界，然而當此國難期間，國家純供經常軍備之費，年爲二萬六千八百萬，平均每月實支二千二百三十三萬餘元。（註二

十五）如此數目，實破全世界國家軍費的記錄。使我們不能不懷着國家爲什麼這樣重視養兵，而輕視整個民族的教養工作。試看現在中國的社會狀態，爲了兒童的教養，有多數人在嘗着若痛呢？他們連單謀溫飽都感力不勝任，更何論求學？受中等教育，在中產階級尙感困難，在一般俸給或工錢生活者自非絕望不可。故兒童的命運若完全委諸父母的生計，勢必和組織健全社會的理想相矛盾。我們若眞期望社會組織能健全，中國民族能復興，那麼我們須對於構成次代社會的

全中國兒童與以營養和教育的均等機會，充分完成其身體的發育，並發展他們的天賦能力。總之，一般兒童的教養費乃是國家養成次代國民的當然負擔，斷不能以財政之如何如何困難，而委卸其責任的。

3 由家庭的教養中心到集團的教養合作運動——我們知道舊的家族制度已成爲時代落後的事實，是無論如何不可避免的。雖然中國農村社會尙保留其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可是因爲災荒現象的頻繁和擴大，土匪騷擾的不已，亦正趨於破落解體。同時因爲近代都市之發達，勞動婦女爲經濟上的要求，大都參加於人類更重要更有意義的生產工作，而從家庭的瑣細的勞役中解放出來。因此，教養兒童的事情，雖是家庭的任務，已因時代的轉變，漸次移歸於社會，對於家族成員也不復是必要的了。他們對於其子女僅爲名義上的父母，實際上已無暇兼顧教養的事情了。

一方因爲產業革命的結果，童工組織的出現，集團教養之趨勢乃是客觀事實所促成，也斷非偶然的。

而況今日中國的家庭，配稱爲適當的教養場所的，到底有幾？這些家庭非但不能發展兒童的智能，培養兒童的良好品性，強健他們的身體，而且是兒童的牢獄！若人家的家庭固不待說，就是富有者的家庭，又何嘗有以兒童本位的教養設施呢？他們的家庭經濟預算中只有吃鴉片和打牌的費用，而沒有兒童教養費之正當的開支。

所謂「新家庭」吧？依然是以個人自由思想爲核心，隱含着新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披上了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的外衣。

而且家庭之中，僅有少數人的親屬的關係，而無更廣大的包含着各階級民衆的子女之人羣的接觸。我們要培養今後次代民族之社會的意識和同情，不能

不於集團的教養制度中求之。

4 從特殊兒童之慈善的救濟到一般兒童保護之社會的經營——兒童保護之由人道問題進爲社會問題，是最近才有的事，是當產婦之保護、乳兒幼兒之保護、少年之職業指導及勞動、不良兒之教化、給與母親的兒童之津貼、一般兒童之養育費等等，對婦女問題及勞動問題等發生關係，而具有社會意義時才有的。

兒童保護事業，在西洋當紀元後一一〇年間羅馬托拉諾斯帝所設立的教養院，是歷史上所認爲第一次的兒童保護事業。最初是專以世間之不幸者爲對象而施以種種的救濟，故兒童所得的權利，亦只限於被救濟的權利。到了十三四世紀，兒童保護事業既漸次超過了教會所經營的範圍而日益膨大；同時遂依近代國家之發展而亦呈顯著的進展。教會自身之經濟基礎因封建制度的崩壞，而逐漸顛覆下來；兒童保護事業之後援者的貴族等，亦就漸次失去了舊有的榮華，

於是這種事業在教會範圍內，便自然地趨於衰敗，而被國家去收拾去舉辦了。到了產業革命以後，童工組織的出現，於是兒童的命運又重新陷於極悲慘的境地。自一八〇二年英國會通過「徒弟健康道德案」，直到一九二五年日內瓦保護兒童宣言爲止，兒童保護始轉變爲社會的意義。

中國的慈幼事業雖起源於很早的南宋時代，但迄今依然沒有進步，所謂孤兒院、貧兒院、婦孺救濟所等組織，既不足以稱爲慈善機關，更不能說是社會的連帶責任。

今日中國兒童保護事業，連帶到母性保護因客觀事實的需求，已爲急待進行的一件事；然而此種保護事業決不是宗教家或有志者對於孤兒、災童或棄兒之慈善的行爲，也不是所謂國家的仁政之片斷的設施，乃是全國家全社會對於次代民族之一種整個的、有意的、有方案的、有繼續不斷性的社會事業的經營。

5 從母親的本能之養育到專家之科學的——教養生產是一切生物的本能，這是不學而能的動作；可是人類自爬上了進化的階段以後，斷不能單憑自然的本能像其他動物一樣地去教養他的幼兒。今日中國的嬰兒大都只有被生的義務，而沒有被教養的權利；他們死亡率的升高，無疑地是由於缺乏以經濟為背景的那所謂科學的教養。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文化的高低的程度，是看他能否對於自然力之最經濟的利用，以增進人類之精神的及肉體的能力。今日中國民族的體格的弱小，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日本學童的體格，三十年來已大有進步的趨向。據東京市教育局統計，在一九〇〇年七齡男童的體高平均為三尺六寸七，七齡女童的體高，平均為三尺六寸一；可是到了一九三〇年，男童便增加到三尺七寸四，女童便增加到三尺六寸七。

然而回顧中國民族的體格是怎樣呢？中國一般母親對於兒童的教養，其知

識及方法又是怎樣呢？固然，我們不能說新婦女也都是無教養的知識，可是我們至少須承認中國現在大多數的母親確不配來教養他們的兒女，而且在目前一般國民經濟狀況之下，連求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的資料尚不可能，那裏談什麼營養？什麼技術？新社會之所以不任父母來教育子女的理由，是因爲教育兒童比生產兒童要困難得多。一百個母親當中，能否有一兩個完全的教育者亦屬疑問。所以今後對於中國次代民族的教養須由社會的立場，以集團的財力和精力，在各專家——心理學家、教育家、營養料專家、醫生、保姆——以及雙親合作指導之下，而試行小組織的（如托兒所、嬰兒園之類）人類共同教養的新制度；因爲這種設施，不曉得有幾十萬幾百萬的母親能解脫舊制度下的無謂的奴隸般的育兒勞役，而可以自由地去從事現代具有社會意義的偉大的整個民族的教養工作，或參加其他生產的勞動以至一切社會的業務。

青年的婦女們，今日中國次代民族的教養問題因時代的推進和社會的變動，既已到了這樣一個極嚴重的時期，你們要求全中國婦女之經濟上和人格上的解放，須從全民族的教養合作運動中，打出一條今後婦女解放的新路。這是中國民族復興的一線希望，亦即新中國青年婦女所負的偉大使命！

(註一)本年十月十日申報紀念詞國難與國慶。

(註二)本年十月十日申報國難與國慶。

(註三)古樸：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適合中國的社會經濟背景（中華教育界十九卷九期頁

二一）

(註四)古樸：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是民衆的（中華教育界十九卷十期頁三五）

(註五)張振之：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頁五。

(註六)馬札亞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頁一七。

(註七)見二十年九月中華慈幼會所發表之救濟水災兒童意見書。

(註八)一九三一年大水災中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

(註九)確定當時普通家庭生活最低用費爲百八十七元。

(註十), Chinese Economic Monthly;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三頁。

(註十一)古棣：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是民衆的，中華教育界十九卷十期。

(註十二)馬倫著：New China 二卷二頁。

(註十三)楊西孟著：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頁八。

(註十四)楊西孟著：上海工人生活程度頁六七。

(註十五)康陶父編：婦女與兒童(頁一一四——一五)。

(註十六)古棣：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是民衆的(中華教育界十九卷十期頁三五)。

(註十七)朱懋激：機械工業的童工生活(慈幼月刊)。

(註十八)張振之：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頁四三。

(註十九)Shanghai Times 一九二七年十月份。

(註二十)張振之：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

(註二十一)慈幼月刊第六期頁四〇。

(註二十二)上海工人生活。

(註二十三)古樸：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是民衆的。

(註二十四)康陶父編：婦女與兒童頁一〇八。

(註二十五)孫九錄：當前中國的財政問題。

托兒所與嬰兒院之理論的基礎

孟如

一

所謂托兒所 (crèche) 和嬰兒院 (nursery) 是指代替家庭父母擔負嬰兒的一部分或全部分教養責任的制度。照目前大部分國家的情形，嬰兒出生後，其最初的教養責任總是屬於家庭父母的。在社會教育事業發達的國家，有幼稚園的設施，代替家庭擔負學齡前兒童的教養責任。但這種設施通常祇收容三四歲至六七歲的已能獨立活動的兒童，三歲以內的嬰孩兒童，它們是不收的。現在所

要講的托兒所和嬰兒院，卻正是對三歲以內（包括初生的）的嬰兒施行教養的機關。這種制度在許多人還覺得是一件新鮮的事情。

提起托兒所和嬰兒院，許多人就會聯想到蘇聯。在早先，有不少人就因為這制度和蘇聯的聯繫而加以盲目的否定。誠然，托兒所和嬰兒院正是蘇聯所努力推行的一種制度，而且，在相當的範圍內，這二者正是實施「兒童公育」的機關。但若使以為是蘇聯創始而且唯一實行着這種嬰兒教養制度的，則事實上並不。我們知道，最初的托兒所是一八四四年在法國創立的。從那時以後，歐洲各大都會都曾經有這種教養兒童的機關設立，雖然大部分是由私人或慈善機關主持，而祇有極少數由國家管理。就在現在，奧國的托兒所和嬰兒院在歐洲也可算辦理得最完善，不過實施的範圍和規模沒有像蘇聯的那樣廣遍而已。

在前月的女聲月刊上，看到了幾篇專論托兒所的文字；而且，據說在江蘇某

處的一個工廠已經試辦托兒所。似乎這種新式的教養嬰兒的制度，目前在我國已漸漸受人注意。或許這是與世界的潮流相迎合的。在國外，因為教育上的思潮的發展，因為社會的情勢的變遷，尤其因為蘇聯的初步嘗試所顯示的成功，托兒所和嬰兒院的制度已引起教育界和社會學界的普遍的興趣。

自從世界經濟恐慌風潮發生以來，中產階級日趨於貧困化，使一般賃銀勞動者感到教養子女的莫大困難。在上層的資產階級，他們的經濟基礎使他們對於教養子女的事情完全不生問題，有許多貴族化的嬰兒教養院就是為他們的子女而設立的，許多有訓練的祿母也專待他們的善價雇用。至於下層的貧窮階級，他們在生活的煎熬中，自然沒有餘力去顧到子女的教養問題，他們多半是把子女的生長聽之於命運的。祇有中等的賃銀階級，他們本身的陶冶訓練使他們認識子女在孩提時代的教養為一個重要的問題，而他們的經濟能力卻使他們

不能照着理想去供應子女的教養的重要。中產階級本來是贊成小家庭制度的有力份子，小家庭制度雖然除去了大家庭對於子女教養上的一些弊害，但也帶來了相等的困難，主要如兒童的缺乏社會環境，和父母同在社會任職時兒童缺乏妥善的照顧，等等。在這樣的情形下，一般中產階級對於兒童的教養便分化為二種不同的傾向：一部分在經濟上比較開裕的便勉力適應環境，為幼年的子女雇用保姆，或者把他們送入貴族化的嬰兒院以至幼稚院；多數在經濟上不能應付的祇能犧牲他們子女所需要的美好教養，但同時他們卻漸漸憧憬於一種能普及於他們的子女的嬰兒教養制度。目前托兒所與嬰兒院的制度的受到注意，乃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中發生的。

然而，這裏應當指出的，就是在主體上，托兒所和嬰兒院的制度的實施當然要以生產勞動者（包括勞心的和勞力的）的嬰兒為對象。這種新的制度和我

們舊式的「育嬰堂」的不同，就是後者爲一種封建時代的慈善性質的機關，而前者則爲以新式的科學化的嬰兒教養方法施行於生產勞動界的一種制度。或者，在過去，就因爲一般守舊者覺得科學化的進步的教育不應普及於下層階級的子女，所以盲目地反對托兒所和嬰兒院的制度。是因爲中產階級的貧困化，把其中的大部分沉入下層環境的變遷引起了他們意識上的進步，於是他們纔覺得這種新的兒童教養制度對於他們子女的需要。

托兒所和嬰兒院的制度在教育心理學上是有着堅強的理論基礎的。目前所有進步的教育家無不贊成這種制度。然而，這種制度的實施，還需要適宜的社會與經濟的基礎。在下面，我要將這二層分別加以討論。

二

在傳統的社會環境中，如果有人主張托兒所和嬰兒院那樣的嬰兒教養制度，就會引起反對的聲浪，而主要的反對理由則是父母之愛對於嬰兒的重要。事實上，這種反對的理由是很勉強的。第一，我們要知道，托兒所和嬰兒院的制度並不是要使嬰兒不認識父母，或把他們和父母完全隔絕。第二，富裕階級的婦人爲了個人的享樂而把子女交給保姆管育，病弱的母性把嬰兒交給壯健的乳母哺育，以至中下階級職業婦女的爲謀生而不得不和子女離開一日中的大部分時間，這些都是犧牲了一部分的父母之愛的。那麼，爲了施行科學化的教養方法於嬰兒而把他們多少地隔離了父母的愛，爲什麼是不應該的呢？

一般教育家都知道，目前大多數的父母對於子女的養育都是無訓練的。他們對於兒童祇有感情的教育，而沒有理智的教育。那種純粹屬於感情質素的「父母之愛」把兒童養成了任性、貪慾，以至自私等等壞習慣，而且給予了兒童以

一種依賴性的薄弱的意志和不能耐苦的身體。常常在一個簡單的家庭中（例如包括一個溺愛的祖母，一個困倦於管育子女而顯示不耐煩的母親，一個嚴厲的父親和幾個子女的家庭，）做子女的差不多是在三種完全不同的教育系統中生長的；而這三種教育系統還都是不合於健全的科學的教育法的。我想幼稚園的或小學的教師們，一定能感覺到對於這種兒童的教育上的困難吧！

英國教育家羅素在他的近著教育與社會程序（*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Order 1932*）中比較家庭與學校對於兒童教育的影響。他舉出兒童所需要的七種環境條件：（一）光線與空氣；（二）適宜的食物；（三）遊戲和玩弄的空間；（四）發出噪鬧聲（指兒童本身在遊戲時的自由呼喊）；（五）同等年齡的兒童伴侶；（六）避開父母的關心；（七）適宜而安全的娛樂環境。這七者都是普通家庭所不能供給，而祇有學校能够具備的。對於嬰兒，上列的七種條件是同樣地需要的。家

庭既然不能滿足這種需要的條件，那麼像托兒所和嬰兒院那樣的教養機關，便沒有可以反對的理由。

照行爲主義心理學的說法，人生許多重要的習慣都是在幼小時候樹下基礎的。但是，在目前一般家庭的感情教育中，非但種種心理上的壞習慣不能免除，就是一些簡單的生理上的基本習慣都不能納於正軌。嬰孩到二歲以上還不能離開母親的乳頭和懷抱；大小便不能自己表示，也沒有定時；飲食不守時間，也無限度；慾望不以言語而用哭號來表示；這些乃是最普通的例子。有些兒童，甚至到了四五歲時，以有進食、睡眠、穿衣等事情還不得不需助於他人。

這裏我們應該把蘇聯托兒所的教養情形略述一些，以證明實用這個制度所收得的效果了。據美國的斐爾特夫人的記載，蘇聯的托兒所是把初生到三歲的嬰孩分爲三等，即初生到一歲，一歲到二歲，和二歲到三歲的；但他們至多只把

二十名嬰孩放在一起。早上七時半，托兒所開門，做母親的把嬰兒送來，在外室替嬰兒換上托兒所的衣服，交給所中的看護。看護收了嬰孩，就把他檢視一次，看看孩子弄清潔了沒有，又把孩子的體溫和其他衛生狀況紀錄下來；然後將孩子送到睡牀，給他休息一下，沐浴，吃奶，弄玩具。到八點三刻，一切已弄清楚，乃穿起衣服，取開玩具，放在牀上睡眠一小時。孩子早睡醒來時，母親恰好從工廠裏出來哺乳一次。到十點半，孩子又回到牀上，弄玩具；最小的有一個球或搖得響的東西掛在牀上，較大的是一個圈，孩子可以用手攀着練習起坐。到下午一點半，母親又來哺乳一次，兼進午膳。母親哺乳時，奶頭都由看護用棉花蘸火酒揩過；哺乳後看護把教養嬰兒的方法向她們解釋——這一步的教育價值是很重要的。到二點三刻，有些嬰兒可以隨下工了的母親回去，有些仍留下，睡眠一次，醒了再弄玩具，到母親下工時來領回去。上面是講第一級的嬰兒，在第二三級的，他們的玩具較多，遊戲

時間較長，沐浴，大小便和進食也都給以規定的時間，所有肥皂，牙刷，手巾等物都指定一個櫃子叫他們自己保管的。

嬰兒的哭在托兒所中僅受到一些注意，除非有了疾病，是決不受看護的理睬的。這種表示慾望的方法，終於爲嬰兒所放棄。據斐爾特夫人所見，蘇聯托兒所中的嬰兒，除有身體上的不適外，是不大哭的。他們在會說話之前已能自己進食。一歲的孩子還不會在室內走路，是認爲落後的。在一歲半時，他們已練成在規定時間撒尿的習慣。同時，他們已練習自己洗手臉，到四個月後，要洗得不濺溼衣服。二歲時，他們便要在戶外雪中自己玩耍。二歲半時，要自己能穿衣服鞋襪，并能自己解下，祇有一顆鈕扣須人幫助。同時，他們能自己進食，抹桌，二歲九個月時，能用扶手而自己下樓梯。二歲十一月時，能幫助洗碗碟，搬送菜食。三歲時，則已能推動一坐着孩子的雪車了。

蘇聯的實行托兒所和嬰兒院制度，不是用以消滅家庭，而是作為改善家庭的主要機關的。當做母親的送嬰兒入托兒所時，如果被發見嬰兒身上的齷齪或蚤類，則嬰兒就被退回去；要等到那個家中弄清潔時，纔許把嬰兒再送來。托兒所和嬰兒院對於做母親的所發出任何關於教養嬰兒的疑問，都盡情解釋。主持托兒所和嬰兒院的都是有經驗的醫生、護士、兒童教育家和心理學家。

這裏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目前許多教育心理學者關於嬰兒教養的理論，都止於理論；祇有在托兒所和嬰兒院成立之後，這些理論纔收到實驗的效用。

三

托兒所和嬰兒院的制度在教育心理上既有着確定的根據，而在許多國家不能得到普遍施行的理由，大概是屬於社會經濟的關係。我們知道，蘇聯的托兒

所和嬰兒院是由國家主持的，這種事業經常地從國庫中支取着不少的費用。但在歐美許多國家，它們的托兒所和嬰兒院除了一部分是由捐款成立的慈善機關外，多半是私人的事業，用以經營獲利的。此外，有極少數是由地方公家設立的，如奧國維也納地方的嬰兒院則在規模上既較私人設立的爲大，收到的效果也較好。

因爲社會和經濟制度的不同，蘇聯的托兒所嬰兒院和其他國家的還有一種根本上的相異點，就是，前者專把這種嬰兒教養制度施行於生產勞動者的子女，而後者則須視嬰兒的父母的財富情形而決定能否給以教養。顯然的，是由於這樣的區別，所以在鼓勵大衆生產的蘇聯，這種新式的嬰兒教養制度能够普遍推行，而在貧者多富者少的其他國家，這種制度便不能發達。

從上面的比較，我們已可斷定施行托兒所和嬰兒院制度的必要的社會經

濟基礎。簡言之，這種制度最適宜施行於一個大衆生產的集合化的社會。我們可以分幾層來解釋。第一，對於一個不事生產的婦女，社會或國家實在沒有應該代替牠管理子女的理由，（當然這是從社會經濟上說，而不是從種族教育上說的）所以，祇有代替從事於生產工作的婦女教養子女，纔是幫助婦女獨立之道。第二，托兒所和嬰兒院的教養制度有着極整齊的規程，在裏邊的嬰兒的母親們必須集中於一個生產場所，而且要那場所的工作程序與托兒所嬰兒院的規程互相呼應，纔能免去任何的不便；但這種條件祇有在一個高度工業化的集體制度的社會，方能具備。在蘇聯，托兒所和嬰兒院是附設於工廠和集合農場的。一個工廠或集合農場有一定數目的母性婦女工作，就應該設立一個托兒所或嬰兒院。這樣，托兒所和嬰兒院不僅是一種教育的機關，而且是與生產機構相聯合的社會機關。這種機關的顯著的社會價值是使婦女能自由參與社會的共同生產。

托兒所和嬰兒院的制度既然是最適宜施行於一個大衆生產的集合化的社會，這裏邊所施行的教育主要也在於把嬰兒培養成一個促進這種社會和在這種社會中生存的人。例如，蘇聯的母兒博物院（Museum of Mother and Child）所舉出托兒所教育的二個目標，就是：一、養成一個爲社會主義結構的活動奮鬥者；二、養成一個唯物的、活動的和集團主義的人。如果嫌這二個目標所用的字眼太術語化，則我們可以約略看一看他們的教養方法中所包含的具體證例。

使許多孩子同飲食同遊戲，守着一定的規則，就是要教他們習慣於有秩序的團體生活。集團社會的生活需要合作與互助，而應避免個性的過度發展與自私。在托兒所和嬰兒院中，給予兒童遊戲的積木不是小小的方塊，而是必須幾個人一同擡起的；這樣兒童乃知道任何遊戲總要共同合作纔有趣味，任何事總要大家互助纔能成功。兒童把一種玩具弄厭了，必須交與其他的兒童玩，不能永

遠保有着霸佔着：這正是用以消滅兒童的自私心的。總之，一切的訓練都是要使兒童成爲一個社會的生物，他不能單顧到自己，而應努力於團體的利益。

然而，在目前的許多國家中，一般主持兒童教育的人還是重視兒童的個性發展過於他們的集團生活訓練。嬰兒從遺傳上所取得的社會地位決定他們享受良好教養的權利。在社會和經濟條件的限制下，托兒所和嬰兒院的制度不得普遍發展，窮苦的生產勞動者的子女在教養上始終是被遺忘的。

四

在本文的開端我曾經指出，目前我國對於托兒所和嬰兒院的注意已經大爲增加，而且某處的一個工廠已經試辦一托兒所。那麼，在最後我們便要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托兒所和嬰兒院的制度在我國現狀下能否得到普遍的施行？

事實上不容否認的，我國的工業建設尚在開端的階段；但是同樣不容否認的，我國的發展是趨向於生產上的高度工業化。曾經有許多人指出，我們的建設將着重於集團化的精神。從這種趨向上，可以看出把托兒所與嬰兒院制度的發展的可能，在我國是很大的，雖然上述的趨向，其表面與實際情形間的矛盾為否成為前途的矛盾，始終是問題。

再把問題說得切實些，如果沒有一個突變把我國的主要生產事業轉為國營，托兒所和嬰兒院的制度是否能得到順利的施行呢？當然，在私人操縱一切生產事業的現狀下，這種公共的制度不能不受到相當的阻礙。但就在這過渡期中，這種有關於民族前途的嬰兒教養制度的施行，仍舊必須在障礙中推進。法律與生產勞動者的覺醒將督促生產事業的把持者捐出其獲得的一部分利潤，供給這種新式的嬰兒教養制度的施行。

我想，關心於社會情形者一定會見到這幾年來我國婦女在生產勞動界的猛進增加。紗廠、絲廠、紙煙廠、膠皮廠，甚至所有大規模的百貨公司，都引收着大量的婦女職工。這些婦女職工的微薄薪資都不足以供子女的教養。我們當然知道，我國的工業發展是重要的，但我們民族的次代的教養問題應當是同樣重要的。那麼我們的立法者，社會學者，教育家以至一切爲社會的進步而努力的人應當怎樣注意於這種新事業的推進呢？本文中簡略地講到托兒所和嬰兒院的理論基礎，希望能夠引起社會大衆的深切注意。

蘇聯婦女兒童保護的理論

趙涵川

蘇聯承認兒童是代表將來的勢力的，所以他們主張兒童應受到良好的保護和教育。至於養育兒童的婦女，則被認為勞動者，所有工人應得的一切利益，婦女也應該得到。他們以為婦女在施行生物的機能時，並不一定要失其社會的生活；質言之，她們不能因為成為母親，而感受經濟或社會的痛苦。她們應該得到一切的機會，也應該受到最大的保護。

其實，俄國勞動階級的組織，早就承認國家對於婦女和兒童應有保護的必要。六十年前，馬克斯主席的第一國際第一次大會，即討論過這個問題。馬氏主張全世界的工黨黨綱上，都應該規定對於婦女兒童的保護。在列寧所起草的俄國

工黨綱中，即有廢除婦女兒童夜工的規定。這種計劃，經過不斷的奮鬥，終於獲得勝利。俄皇批准了一條法律，禁止婦女作夜工。有少數工廠，且要求設立產婦室及勞動婦女的保險；有些甚至要求設立工廠保姆室。一九〇五年，他們要求婦女有產前產後的假期，而且假期中照給工資。有些團體甚至要求有小孩的女工每天應有半點鐘的假去哺餵小孩。到了一九一二年，俄皇政府再通過一條法律，規定因疾病或意外事變不能工作的工人及懷孕的女工，均得享受保險的利益。在這條法律下，女工產前得有兩個禮拜的假期，產後得有四個月假期而工資照給。這條法律對於勞動婦女的待遇上，可算是一大進步，但因僅適用於大工廠，所以受益的不過是少數女工而已。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一個月，勞動婦女舉行第一次大會，對於這個問題曾加以深詳的討論，最後擬定一個詳細的綱領，現在蘇聯對於婦女兒童的保護，

還是以此爲根據。不過這過綱領，到十月革命以後，才有人給以深切的注意，當時列寧說。

「假若佔勞動人類半數的婦女未能享受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假若婦女仍是家務的奴隸，社會主義的勝利絕對不可能。」

同時他又說：

「每一個有智慧的婦女，一方面應該知道如何參加政治，但也要知道如何烹飪。」

在蘇聯的意思，以爲列寧並不想破壞家庭，卻是想改進家庭。但要達到這個理想，卻有種種困難。莫斯科的婦女兒童「保護小博物院」中曾舉行一個勞動婦女會，討論過這個問題。

第一點，女子因爲身體組織不同，絕不能和男子一樣獲得完全的社會的自由。在其生活中，總有一個時期，身體精神兩方面感覺消沉，在懷孕期間，她的能力

減退，而在生產時則更像一個殘廢者。再者，因為家務及小孩的照管，她差不多沒有時間可以增進自己的學識。在這些情況下，她當然需要保護，否則她便不得不放棄她的家庭和子女。所以國家的第一個重要責任，就在解放婦女，設法幫助她的家庭，使她在社會及經濟兩方面，成爲一個獨立的人。國家也要設法防止農工家庭中嬰兒的過度的死亡。因為國家需要大批的勞動者，絕不能讓人類的生命浪費。三則國家應該教養一個康健的新後代，給與最良好的社會教育。

因爲這些原因，所以由國家設立了一個『母性兒童保護所』。『這保護所』的第一種工作，就是設立工廠保姆室，收容幼稚園時期以前的兒童。婦女早晨上工，可以把兒童留在裏面，晚上回家，再把兒童領回。假若嬰兒尙未斷奶，可以到其中餵奶。這種機關，卽是一般所謂的託兒所。有了這種組織，許多婦女都能和他們的丈夫一同工作，並且她們的嬰兒也能得到最新式最有效的方法的養育，託兒

所也幫助家庭改進其物質狀況，因為這種託兒所是免費的，（但僅限於工人的兒童。）並且每天供給兒童以食物和衣服，所以家庭的負擔可以減輕。

自十月革命以後，託兒所的數目大為增加，現在蘇聯政府每年用於託兒所的費用，共有十萬萬盧布之多，現有工廠託兒所一千所，即是說，每年每一託兒所共需一萬盧布。現在世界上較富裕的國家，所有的工廠託兒所，其數都較蘇聯為少，而且絕對不是由政府補助款項的，由廠主辦理者也很少。不過蘇聯的託兒所實際也還是不够用。在一九二八年，勞動婦女能享用託兒所者不過百分之十七，又因為勞動婦女人數日增，對於託兒所的需要亦愈甚。在計劃上，他們規定任何工廠或公司，若用工人有百人以上，就應該有一個託兒所。不過這種情形，並不能普遍如此。

在起先的幾年，託兒所雖有增加，但是仍祇有很少數婦女參加政府的工作。

這並不是因爲蘇聯不贊成婦女在政府服務，原因是勞動的婦女，即使她們的子女能整天交給託兒所，而到夜晚工作完畢，仍須自己照顧。在晚間，工人每有集會，或補習教育，婦女因爲要照顧子女及家庭，總不能儘量利用她丈夫所可享受的機會。爲了這樣，婦女兒童保護所乃再設置夜間託兒所，到女工的家庭中視察兒童，在俱樂部及工廠社會廳中設置兒童室等等。

自十月革命後十年間，政府只能用一半努力在這一方面，另外一半努力，則用以對付戰爭，饑荒以及疾病。在這個期間，所有保護無家兒童的方法都已用盡，結果到了現在，蘇聯的每一個無家兒童，都有地方收容。這可說是保護婦女兒童的第一項工作。至若其他組織的發展，雖然較緩，但一九二七年已有九百九十七所託兒所，享用的婦女共有三萬餘人。

此外，保護婦女兒童的機關，尚有下列數種：

一 產婦收容所，婦女產前二月，產後二月，均可入內，但只限於最貧的婦女，當時共有一百二十二所。

二 貧兒孤兒收容所，共一百二十六所。

三 無家及被棄婦女收容所，共二十六所。

四 健康顧問局，共四百六十一所。

五 產婦醫院。

婦女兒童的保護機關雖如此增加，但政府仍盡力宣傳，要那些已得保護利益的婦女善用她們的機會，同時再求機關的改進，演講廳的牆壁，常貼有不少統計，表明政府用於這種事業的金錢。

婦女即使生活在資本家保護之下，但在生物學方面，仍不外是一種奴隸，因

爲前後三十餘年每月月經的來潮和懷孕期及生產前後的疾病總是不可免的。不過富裕階級的婦女是不要緊的，她們仍可以和她們的丈夫一樣，不必照顧家庭及子女，因爲她們的一切日常工作，可由僕人代做。所以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我們仍可見婦女們參加社會上各方面的活動。換言之，大凡經濟獨立的婦女，假若任她選擇，她常能享受和男子同等的自由。

反之，勞動階級的婦女，就很少有社交的生活，實際上也不知道社交是什麼東西。不論她的天賦如何聰明，但因爲不會受相當教育，所以她不能獲得充分的工資，以養活她和子女。她的全部時間都不得不用在家務的處理上。她的工作時間不僅祇八小時，她那裏能有時間金錢或精力來參加社會活動呢？所以，即使是資本主義熱誠的擁護者，也不會說婦女應該是這樣一種奴隸；否則，爲什麼資本家應該出款救濟勞動婦女呢？家務也不一定是社會奴隸的標準，因爲也有

許多男女專門喜歡這種工作的。這樣可知所謂奴隸，並不在任何種作業方式中，而在強迫個人做他所不適宜做的工作，或強迫他做不能做的工作。所以婦女應該有機會和準備，以便過她所願意的生活。

這即是主張男女生活機會平等的社會制度的基本原理。在社會主義之下，國家是最有力的社會機關，即國家對社會負有最大的責任。所以國家應該使社會各個人獲得生活的必需，並且有平等享受的機會。蘇聯所以努力使社會人人，在經濟、社會教育諸方面平等，其理由即在此。

大凡受着資本主義傳統的人，都以為只要經濟獨立，婦女就可以從社會的奴隸轉變到解放者。例如美國的一種主要社會政策，就在使勞苦的勞動者成爲一種小小的資本家。但這種人有時會成爲小資產階級，即等於中等階級。不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突然把這種自由給與勞動階級，乃是不可能的；因爲若是實

施這種辦法，即不再有體力勞動者存在。所以享受資本主義利益的人，必得不做資本主義所輕視的事情。但在以勞動及效率爲最大理想的制度下，不論所做的工作是什麼，大衆的社會自由及經濟自由，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會發生的。所以我們最先應該知道，蘇聯現在是在努力於達到它的理想，先使每個婦女都有成爲良妻賢母的機會，然後讓她有充分的多餘時間和經濟安定；假若她有才能和興趣，她可以有機會從事她所願意的文學或藝術的事業。一個婦女若是一個良妻賢母，對於她的子女當能給以一種良好的給養。不過要做這種事情，她不能完全靠她自己，她仍舊要把她的子女交給學校教師去教育。所以國家應該使婦女獲得自由，得以教養她們的子女，並給她們種種機會。這便是蘇聯所實行的由國家管理大衆教育的一個重要理由。

現在一般人和社會學家都常常懷疑，社會主義要毀滅家庭及家庭生活嗎？就現在的情形而論，例如日間保姆室，學校的舉辦，社會生活的提倡，以及婦女和男子同樣在工廠中工作，似乎家庭在社會生活中確是一種次要的東西。不過，在作概括的結論以前，我們應該考慮一下表層以內的情況。我們知道，人類工作的平等乃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理想，欲實現這種理想，不論男女都應該不做不必要的生活瑣事，因為不做這些瑣事，也無害於個人的責任。即是說，個人應該有充分的自由得選擇他最宜做的事情，但應以無害於社會為限。個人若勉強從事衣食住等的獲得及維持，必致減少效率，不能做其最適宜的事情。例如，一個人的衣食住若不解決，必不能成爲一個藝術家；反之，除非他得到他人的補助，則他自始必不能得到衣食住等必需品，同時又不致使其藝術被社會所重視。這一點是任何人都明白的，但我們常常忘記的，就是這種道理也可以應用在勞動階級上。

面。一個人若有一種管理機械的才能，假若他不得不自己做衣穿，自己煮飯，自己照料家庭，他必不能做他所專長的工作，因為這些工作都是極麻煩的，可使他無力再做他所喜歡的工作。這種道理，在婦女方面也可以同樣應用。所以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一切作業都認為有價值，僅依其所費的勞力來分類，即一切體力勞動者屬第一類，教授，書記等屬第二類。至若在家庭中工作的婦女，其重要亦如工廠中的婦女，所以自應享受同樣社會保險的利益。所以政府應幫助一切工人得到生活的必需品，而在工廠中工作的婦女，自然要有一個適當的地方放置他們的子女。至若在家庭中管理家務的婦女，當然也要有一些人代她們由礦山中取出她們所燒的煤，織她們所着的衣服，屠宰她們所煮的肉。實際上，國家保護兒童的機關，並不就在減低家庭生活的價值，因為家庭生活也是個人發展上的一個重要因素，並不是一種束縛的方式。這些組織的目的，乃在使個人在其所選擇的

作業上獲得最大的效率。假若這種家庭不復存在，其原因乃在人們不喜歡維持他。而喜歡其他作業。我們不能說家庭不必要，我們所需要的一切就在我們飲食或睡眠的地方。因為，即使我們有同樣的房屋，有同樣的裝飾，但因為我們各人的嗜好及需要不同，故陳設的佈置亦彼此各異，我們每暫時居住在旁人佈置的屋內，便感覺不安，原因就是別人屋內的空氣和我們自己不完全適合。所以社會主義並不在消滅家庭的生活。因為人們都應該有他們喜歡的地方以便居住，所以假若他們在工廠中或田間工作較佳，他們就應該有公共食堂，使他們得有餘暇享受家庭生活的愉快。若以為一個人不喜歡烹飪，然應該故意叫他下廚房烹飪，無異使不喜歡機器的人開汽車，是同樣滑稽而危險。但一個人不喜歡烹飪，並不就應該教他的子女不懂烹飪的技術。國家的責任，就在辦理公共廚房，教青年們了解管理廚房的技術及必要，因為有些兒童也許喜歡選擇烹飪為職業。

總之，真正的社會主義乃在發展各個人的效率及其個性，不論對於家庭中的工作者，或從事其他職業的人，都是如此。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5 9935B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一一七七三)

東方文庫編 婦女兒童保護問題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主編者

王雲 李聖 五五

發行人

王雲 五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22



1660065